

【理论研究】

加速、减速与失速： 现代社会时间模式的多重型构

徐 律

【摘 要】社会加速是当前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议题。罗萨通过将社会加速视为基于技术、社会、生活间主体性关系型构的社会时间模式,构建出系统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然而,在对技术与社会关系作用的考察中,罗萨因忽略了技术工具效能的社会证成问题探讨,造成社会加速发生机制论证不完整的问题,削弱了加速作为现代社会变迁总体态势判断的有效性。对此,以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为分析主轴,通过引入科学技术社会学视角,借助技术范式革新与技术社会建构两种技术社会化理路,考察技术与社会间非线性作用机制,补足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分析缺失。进一步,在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失序危机基础上,将社会加速、减速与失速视作三位一体的现代社会时间模式,为现代社会变迁的总体态势给出更合理的诊断线索。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社会时间模式;社会加速;科学技术社会学

【作者简介】徐律,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浙江行政学院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副教授(杭州 311121)。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23.2.75~87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型构社会学理论及其当代启示”(2022M711561)阶段性成果。

如今,无论是在大众读物还是在严谨的学术作品中,社会加速都是最受关注的社会议题之一。^①社会加速议题的兴起离不开个人对现代社会生活整体变迁的经验感知。现代化进程下,随着社会变迁速率、范畴的不断增大扩大,一方面,现代社会呈现出异于传统社会的多元化面相,^②诸如工业化、理性化、民主化等早已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另一方面,现代化多元表征背后也蕴含着以社会加速、减速、失速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社会一般属性。^③在当今愈发多元的研究趋势下,如何“系统解释现代性与现代化多重面向就构成了当下社会与政治理论研究的主要挑战”^④。对此,作为因应现代性后果诞生的社会学,以社会加速为主题展开社会学探索,将不仅为我们全面深入理解当代社会现代化状况提供切入口,也为学科发展反思提供可能。

一、社会加速:一个现代性的社会认知议题

(一)从经验型到事件型:现代认知模式转型下社会加速议题诞生

现代化进程下,新兴事物的涌现不断脱离个人基于惯例、习俗等传统经验的认知范畴,个人将面临常识经验陌生化的认知窘困。此时,个体对外部的稳定认知边界(Boundary)愈发模糊,^⑤这进一步引发了个体自我价值及心理基础结构重塑,一种生发于认知不确定性的存在性焦虑成为日常生活体验。而如何于充满不确定性环境中自处,直面存在的焦虑体验就成为个体日常生活中的难题。在这里,存在性焦虑体验是助推现代社会个体从经验型向事件型认知模式转型的重要契机,而认知模式转型带来的认知机制与路径的变革也给现代性研究产生深远影响。^⑥具体而言,所谓经验型认知模式运作基础在常

识经验,即“过去”是个体认知事物与展开行动的重要时间维度,个体多凭经验做事。经验型认知模式运作下,现在与未来也被吸纳进“过去”这一常识认知的中轴,三者构成了相对稳定的连续性认知图谱。而当依附过去经验的习惯、习俗等传统常识难以解释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时,认知中轴逐渐由过去转向诸如各类事件所突现的“现在”,这即基于“现在的”时间维度的事件型认知模式取代基于“过去的”时间维度的常识型认知模式的过程。事件型认知模式下,事件所依附的“现在”不断被压缩、愈发瞬时化,经验难以与愈发短暂的“现在”事件相关联,以“过去”为中轴的整全认知链被打断,身处认知游离状态的个体其社会认知与想象将不断延展。^⑦此时,同个事件可能被赋予多元因果叙事,而分属不同叙事空间的事件也将在不断被解放、跳跃的“现在的”认知时空中,以同种因果叙事逻辑得以链接,表现为个人将多元的现代生活体验进行同类项的因果叙事组构合并,弱化了对事物本身的本体性考察。^⑧这种极具关联性、建构性的认知模式也深深影响了常借用自然科学概念、命题展开研究的社会科学,社会加速研究便是典型。

社会加速虽已成为当下大众与学界熟识的流行议题,但极具建构色彩。从词义的日常所指上看,社会加速分别由社会与加速两个概念组成,加速对应速度变化,多指向单一方向的事物自然运动状态,社会则涉及人与人互动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与自然加速殊异。因此,两者分属不同认知维度,至少不完全重叠。质言之,社会加速概念及其议题诞生离不开个体对现代社会动态化、弹性化的认知与想象,通过对自然与社会两类不同认知域及概念的关联来开辟出对各类新兴现象、议题的研究空间,这也是事件型认知模式影响下现代性研究的鲜明特点。

社会学史视域下,古典社会学时期就产生以社会有机体、社会进化论为代表的基于自然与社会间隐喻式的学科想象,为不同学科间概念、命题的融通与应用提供可能。当前的社会多因分析(Multi-Factorial)可视作这一理路典型,即针对某一社会现象,将不同认知域中诸概念、命题乃至范式进行融汇组构,从而形成多元因果解释策略。这为在承认现代社会现象复杂发生机理基础上,进一步延展丰富的研究议

题提供可能。当然,这一跨领域的认知理路也存在局限,往往以共性的比较与对差异的覆盖替代现象背后的深层机理探索,“没有试图具体说明所涉及的主要因素,更不用说它们之间的关系了。”^⑨而针对特定现象的多元化议题探讨及其多重因果解释本身就易造成问题失焦。相应地,多因分析的另一端则对应于宏大理论叙事的单因(Uni-Factorial)分析,即从特定视角出发,对多元化议题背后的一般化社会规律进行抽象考察。在社会加速研究脉络中,两种取向多一同出现,共同形塑了社会加速研究谱系。^⑩

(二)把时间带回来:作为社会时间模式的加速研究

在社会加速研究谱系中,马克思、齐美尔、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家通过劳动、都市精神生活、理性化等议题将现代化研究操作化,社会加速议题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触及,但也造成对加速本身性质、范畴讨论的忽视。汤林森就指出:“在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的经典社会学论述中,加速或多或少是其他辩论的随机附属品”^⑪。尽管多元分析理路直接拓展了社会加速的初始研究空间,却也使得诸多加速议题间产生了研究区隔与泛化,从而导致本体论维度的研究失焦,回避了对“社会加速为何”这类基础问题探讨。

进一步,这将引发个体对社会加速体验的认知泛化,即模糊作为个体性加速体验与作为社会事实存在的加速状况边界,于“所感即所是”的社会认知与想象中,默认社会加速作为一项独立的社会事实研究合法性而不探究其为何,从而衍生出类似“当下社会就是加速的社会”等笼统且无力的论断。因此,及至当代,加速仍是“晚期现代性理论家与全球化分析学者对诸如信息技术、社会时空转型下有关关系性与流动性特质等反思的附属品”^⑫,如速度问题在鲍曼对流动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的隐喻式反思中被消弭了。^⑬卡斯特的“虚无时间”(Timeless Time)概念则将系统速度和“全球流动”作为一个隐藏背景。在厄里对全球化的主题探讨中,速度仅是和权力、信息、技术一起引发全球性不确定的众多因素之一。^⑭当代社会理论虽为现代性赋予高度、流动、晚期等更细致的类型学划分,但系统性理论探索却止步于全球化、信息化等宏大学科叙事下多元议题的发

散而难以成形。质言之,在这一摇摆于宏大与多元化的张力学叙事下,社会加速更多被视为现代性修辞。社会加速研究议题愈多,对社会加速内涵及其发生机制的考察也愈难,以至于“就社会加速内涵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献似乎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定义”^⑤。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何种研究理路将是可能的?回到社会加速议题诞生的现代性发生语境,通过将社会加速的词义分析与型构社会学研究理路相整合可为此提供分析理路。

从语词上看,社会加速反映现代社会变迁状况及其基本态势,社会速度可视为理解这一态势的基本线索。不过,社会速度涉及现代化进程下有关经济、文化、个体心理等多重维度,因而并非真的如字面上的以一种类似于精准的线性“物理速度”标准对应现代社会变迁态势,仅是一种模糊的现代化状况及其特质指涉。正因如此,“速度和加速度的概念被当作同义词使用,也就是说,对加速度的感知和在高速下发生的过程被认为是同一件事。”^⑥而既然非线性的社会速度指向现代社会发展变迁多重维度,这意味着这一概念本身具备支撑其作为社会发展变迁一般性规律分析的基础性功能,而社会时间正是社会速度这一基础功能的构成型要素。正如创建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罗萨所言,“社会世界中的所有事件、对象和事务状态都是动态的过程,因此时间是任何适当的社会分析的关键范畴”^⑦。质言之,社会加速问题可转化为社会时间问题加以探讨,社会时间分析将是系统展开社会加速研究的关键。

在当今对社会加速问题展开系统性理论探索的学者中,罗萨在其代表作《社会加速:现代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中就将社会加速视为现代社会时间结构改变的结果,其关键分析策略在于借助埃利亚斯型构社会学(Figurational Sociology)方法论来厘清作为连接系统力量与个体行动间功能的社会时间与社会加速的关系,从而在考察社会加速发生机制基础上来建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⑧所谓型构(Figuration)即是基于长期人与人互动下所产生的关系性结构,社会互动链是这一关系性结构的具体呈现,是展开型构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就此,作为基本要素的社会时间尤其是现代社会时间代表规约个体行动的制

度符号系统,这套符号系统形态及其社会意涵则随社会互动链长度、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在现代社会,社会互动链长度与数量规模增加将产生对“个体在计划、调节和时间排序上的压力”^⑨。诸如节庆、纪念日等正是个体习得并遵循这套系统的社会化途径,进而不断在日常生活学习与筹划中形成对各类社会事件、计划遵循的习惯。^⑩社会时间结构正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时间规范作用的具体形态。

可以看到,社会加速产生很大程度来源于现代社会互动链条愈发复杂化、规模化趋势背后对个人行为规约的压力,而众多参与社会加速的要素、主体间互动则可以视为分析社会加速的关键线索,这便涉及这些主体、要素间互动实践的关系问题探讨。换言之,社会加速议题可转换为由不同主体、要素在时间的制度规范实践中所型构出的关系性议题。而社会加速现象则可看作不同主体、要素间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呈现的一种关系性模式,从时间规范的实践上归纳,即可视为社会时间模式类型。^⑪

综上所述,社会加速问题指向非线性的社会速度分析,从罗萨借助型构社会学分析理路展开社会加速与社会时间结构的关系探讨看,社会加速可转换为不同主体、要素间互动所型构的时间规范实践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加速研究不能仅限于人与人之间所塑造的关系结构探讨,诸如技术、文化与社会都应当作为关系结构形塑的主体。而不同互动实践将形塑出不同时间模式,加速正是这一关系性制度实践过程中指涉的社会时间模式的一种。借助这一基于主体互动的关系性分析理路,下面将以当代社会加速理论研究的两大取向——罗萨为代表的晚期现代性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与韩炳哲为代表的后现代加速理论展开比较分析,在厘清社会加速本体性内涵基础上,尝试就多重现代社会时间模式展开探索。

二、两种加速观及其分歧:基于罗萨与韩炳哲的比较分析

依据型构社会学的分析理路,不同社会时间模式意味着社会变迁中不同主体、要素间实践模式的不同,而差异性关键在于对社会发展变迁态势、方向、路径的基本预设。这也引发众多学者对现代社会变迁态势的不同判断,在众多学者中,罗萨与韩炳

哲两人分别从晚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语境出发,发展出迥异的社会加速分析理路。下面将展开两人加速思想的比较分析,在考察加速为何的本体性问题域基础上,就社会加速理论建构展开反思性探讨。

(一)社会加速的多维分殊与循环整合

对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等不同社会变迁阶段进行类型学划分往往是把握社会变迁特质的重要方式。当然,这些类型学划分往往是模糊的、理想型的,某一社会事实的发生发展常常贯穿不同阶段,“属于后现代的东西也能在现代中找到,而在现代中存在的东西也能在晚期中世纪找到”^②,那么,在特定社会发展语境下开展社会加速理论建构工作,如何既能保持分析精准性与解释普适性,则成为重要的研究指引。对此,罗萨鲜明地立足于晚期现代性语境,将社会加速问题置入批判理论学派经典的社会诊断脉络中,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正是这一系统建构社会加速理论的重要尝试。

具体而言,与同期批判理论代表耶姬一样,罗萨将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社会加速理论的研究旨趣,从技术、社会、生活等三个加速维度整体把握社会加速内涵。其中,技术加速是“技术性的(即基于机器的)目标导向过程的加速”^③。线性的工具效能是这一加速的核心表征。因此,在运输、通信、生产等领域的技术发展与创新是实现技术加速的重要动力。在新兴交通与媒介技术应用下,以目的为导向的技术工具效能逐渐释放,社会互动逐渐摆脱既定的物理空间与时间束缚,进一步推动了晚期现代社会关系的变迁。

如果说科技加速是可直接观察的“在社会当中的加速过程”,那么社会变迁加速(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Change)则“可以被归类为社会本身的加速”^④,涉及习俗、规则、文化等关乎社会秩序的变迁维度,并非如前者有统一的经验指标度量。对此,罗萨通过借助吕柏“当下的萎缩”(The Contraction of the Present)来指代晚期现代社会变迁中个体经验的稳定性状况,如将当下(The Present)视为具有一定“经验稳定性的时段”^⑤,那么,“当下的萎缩”便意味着“当下”作为特定经验留存的时、空间越发受到压缩,其所贮存的过去经验有效性、稳定性愈发丧失,导致社会成员间共识也愈难形成。同样地,如将不同社会发展

阶段按照经验稳定性进行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晚期现代社会等划分,那么,个体经验的有效性将被限定在跨世代、世代间、世代内等范畴。简言之,与有意图的、目标导向的技术加速不同,社会变迁加速体现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变化,呈现为社会规范、价值本身的嬗变。就生活加速(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ace of Life)而言,客观上,表现为“单位时间内行动片段的浓缩或压缩”^⑥,多通过如加快行动的速度,减少不同行动之间的间隔距离或同个时段统筹多个行动实现。而这一客观事务量的增加也从主观上给个人带来忙碌、倦怠等时间匮乏心理体验。个体对美好生活的世俗化价值诉求是这一加速产生的关键。在现代世俗化进程下,如何提升个人竞争力以便有更多更好的个人成功经历,则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世俗化社会核心价值的重要路径。这样一来,不是时间本身变少了,而是单位时间处理更多事务带来的紧迫感增强了,这就容易催生时间匮乏体验,衍生出压抑与焦虑。

根本上看,以上三种加速分别与技术理性、社会规范、文化心理等不同的社会加速逻辑对应。其中,技术、社会与文化既作为三个加速维度也作为加速要素相互作用,形塑出以总体社会加速为主轴的现代社会时间模式。不过,具备工具效能的技术加速并没有让生活更闲适,反而促成社会整体加速,因而技术与社会并非对立二元关系,这即是以非线性社会加速内涵为基础的技术加速悖论,是反技术决定论的。要理解这一悖论的生成原因,需对以上三种加速的作用关系做进一步整合分析,对此,罗萨提出“加速循环”来融通不同的社会加速逻辑。

加速循环旨在说明科技、社会变迁与生活等三类加速维度,即加速要素间存在的相互形塑,共同推动形成总体社会加速状况的闭环逻辑。在社会竞争与世俗化两大动力助推下,技术创新与进步成为社会成员通过竞争获得社会成就的关键,生产、分配与消费等诸领域无不受科技加速影响,不断形塑个人的日常生活形式。^⑦于是,科技加速造成社会结构分化,社会关系愈发复杂多元,社会规则、价值亦发生变化,助推了社会变迁加速。进一步,在与传统价值规范脱钩中,个人只能在追求社会竞争中以期避免丧失潜在的价值选择(Potentially Valuable Option)与社

会链接(Connections),日常生活筹划与行动变得异常紧迫,这又反向逼促科技加速来化解日常生活困窘。

因此,加速循环的提出不仅为理解诸社会加速类型的有机关系从而综合把握社会加速内涵提供基础,同时其内含的反技术决定论立场,也为理解技术加速与日常生活加速间看似矛盾的逻辑链接提供整合线索,技术加速并没有带来慢生活,反而因引发的社会事务增长率超过科技应用下的工具效率提升产生看似矛盾的加速悖论。

(二)社会时间的质化型构与虚无消散:社会加速本体性内涵的比较定向

回到社会时间的加速分析视域,无论是就技术加速突破物理时空障碍形塑社会关系,还是社会变迁加速中经验有效性的加速衰减影响社会稳定,抑或生活加速中导致个人主观焦虑与抑郁体验,三种加速尽管其内在运作逻辑有很大差异,但技术、社会与文化间并非以决定与被决定的作用关系推动社会加速。质言之,三类加速间的循环式逻辑整合立足于非线性的社会变迁特质预设。^③

如果说,技术决定论是线性加速观生成的重要基础,那么罗萨则立足非技术决定论立场,形成了基于三种具不同加速逻辑有机整合的质性加速观,科技与社会、生活加速间的加速悖论正对应了非线性的质性加速观。具言之,按现代社会发展阶段分类,古典现代性语境中技术与社会关系如果大体上对应线性时间观及加速观,那么,罗萨所依据的晚期现代性语境则对应于非线性时间观及其质性加速观。而当把视角转向后现代社会语境,有关社会加速的现象分析基础将进一步随社会主体、要素间作用关系的演变发生变化,韩炳哲的时间理论正是这一后现代加速理论中的典型代表。

韩炳哲并没有像罗萨那样试图建立系统的社会加速理论,而是直接否定了加速存在。他认为“当今的时间危机并不是加速,加速的时代业已过去。现如今,我们所感受到的作为加速的那种东西,只是时间消散的诸种症状之一”^④。他指出,时间这一作为考察社会变迁的基本要素已经消散,更遑论社会时间生成中不同主体的互动关系讨论,进而由时间规范的实践所支撑的社会时间模式问题讨论也将失去

意义。于是,通过将罗萨与韩炳哲的加速理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方面,罗萨是借助时间社会学为社会加速作为独立实在主体赋予质体化内涵。另一方面,韩炳哲则基于存在论维度的时间分析理解加速性质与社会变迁态势,其论述基础是建立在否认前者“加速普遍存在”这一预设上,认为时间的虚无化也使加速无存在根基,更无必要建立有关加速的系统性理论。因此,韩炳哲没有像前者那样通过对社会加速的类型化处理,厘清原先就模糊的社会加速内涵,并以此赋予社会加速丰富的质体化内涵定位。后者从根本上拒斥了前者理论建构的基本预设。

进一步,回到型构社会学的分析视域,就韩炳哲的虚无时间观进行考察。如前所述,现代社会时间作为制度性符号系统,具有规约、协调个人行动,从而维护社会运作的功能,而韩炳哲的时间消散论则直接取消了作为认知、筹划社会事件乃至维系社会运作的社会时间基本功能,时间原子化便是这一论断的核心逻辑,即“基于时间的消散,不可能有任何持续的经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缓时间。生命再也不能被置入秩序的构造物之中,或者说能够创造一种持续性的坐标之中”^⑤。就加速状况而言,“作为一种真正的现代性现象,预设着线性的、目的论的发展过程”^⑥的加速也将难以可能。简言之,韩炳哲的加速分析是建立在线性机械的加速内涵设定与对当下社会时间功能的虚无判断基础上,从而否认当代加速的存在。相应地,罗萨则积极寻求社会加速的质体化一面,认为社会时间功能仍然在稳定运作,即由不同主体参与社会互动所型构出的稳定关系结构是诸社会加速得以进行理想型分殊与质体化整合之前提。型构作为社会关系结构的分析工具是罗萨建立坚实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并对总体社会加速态势做出判断的基础。

因此,罗萨质体化社会加速观的形成是对以技术、社会、文化等要素间非决定论式型构作用关系的分析为基础,以社会时间功能的稳定运作为基本前提的。反之,技术、社会与生活间将因失败的社会运作而难以形成总体加速态势。质言之,社会加速产生是基于具不同主体间互动实践的质化型构历程。而当社会型构无须也无法支持作为认知与规范的时间功能运作,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基本时间向度

将在愈发无序的社会运作中逐渐失去彼此间的张力,事件因果与意义将因时间的虚无特质而难以定向,“没有什么把诸事件彼此结合起来,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关联,也即一种持续。于是知觉所碰到的是无法预料到的或者突发性的东西,这就造成一种弥漫性的恐惧。”^②在韩炳哲看来,时下各类加速话语毋宁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恐惧状态的认知幻象,而这种不确定性是无法用线性、具目的论指向的加速来把握的。

综上所述,韩炳哲的虚无加速观建立在以机械论式线性内涵定义与对当下社会时间功能虚无判断的双重基础上。因此,看似激进虚无的加速观背后隐藏着线性时间观及其机械加速观的保守一面。而罗萨则高明许多,他借助反技术决定论立场拒斥单向度加速的内涵解析,将原本属于自然科学的机械式线性加速概念置入技术与社会、生活间质化型构作用机制中考察,从而呈现社会加速的复杂内涵。当罗萨用加速循环概念探讨诸社会加速的质化型构机制时,其实也为拓展以社会加速为主轴的社会时间模式研究提供新的出发点。

(三)技术工具效能与社会中介效应辨析: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进阶反思

以特定社会型构下时间功能运作为基础,罗萨将技术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型构机制融入社会加速研究中。社会加速被视作具社会性内涵的独立研究对象,这是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重要贡献。

而正如前文所述,在论及技术与社会关系中,罗萨借助对技术加速下加速悖论的现实逻辑证成来拒斥技术决定论取向的机械加速观,其中社会扮演着反向的决定性角色。以电子邮箱为例,尽管电子邮箱能极大提升信息事务处理效率,但实际上这种“对事”的工具便利性却能被转化为“对人”的行动紧迫性,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通过电子邮箱这一媒介涌入日常生活,以至于个人生活愈发忙碌,这其实涉及工具效能提升与事务量增长的关系问题。很明显,后者的增幅是超过前者的,否则,技术力量将引发“空间、时间和彼此之间关系的改变……从而影响了主体性和社会的形式”^③,也就不会导致加速悖论下的社会加速态势。质言之,不断增加的社会事务处理需求溢出了单纯工具理性逻辑下的事务处置范

畴,技术工具被反向转化为增加个人社会事务量处理的媒介通道,这即一种社会性的反向中介作用机制。由此,“对事”的技术工具效能相对性、动态的社会竞争关系的推动与世俗文化的加持下,逐渐向“对人”的事务量增长的社会效应转变。

通过强调社会对技术这一反向的中介作用机制,罗萨为技术赋予了社会性的建构内涵。不过,这一社会效应的产生是以技术工具效能的有效发挥为前提的。同样地,在电子邮箱例子中,尽管技术加速中“对事”的工具效能会被转换为“对人”的忙碌社会效应,但电子邮箱本身的工具效能的正常发挥却是支撑这一反向中介机制的前提。由此,这就预设了技术工具效能天然性这一前提,以至于无论其工具效能导向正的(闲适生活)或负的(忙碌生活)社会功能效应,根本上都没有脱离这一前提,即当下忙碌生活也离不开作为高效信息中介的技术效能发挥,而社会则因工具效能的天然证成预设而缺场。

由此,有关技术工具效能何以可能的问题就被悬置起来,忽略了社会是如何影响技术工具效能的问题探讨。在技术与社会关系上,因缺乏技术效能形塑的社会学分析,而偏重社会中介效应的讨论,两者间缺乏相互作用的完整论证,进一步导致在社会效应论证中社会反被视为技术进步的的决定性力量。^④这就容易引起对罗萨反技术决定论立场是否彻底的质疑,同样看似激进的反向社会中介效应背后是不完整的反技术决定论。对此,需回到技术工具效能何以可能的问题域中,并在工具效能与社会效应进行分析性区分的基础上,对技术与社会的作用机制及其整合展开讨论。

三、减速的社会建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反思与议题拓展

当罗萨预设了技术工具效能的天然性时,就在分析上割裂了技术工具与社会中介效应间的互构关系,但实际上,两者的产生却是一体的。在考察加速循环概念下技术与社会的作用关系时,因缺乏两者间作用转换的完整论证,更多呈现为自然证成的科技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的对立关系,导致在与加速相关的减速议题中——诸如“减速现象”“减速地带”就易被设想为“绿洲”,一种基于技术—社会二元关系的有待被征

服的独立于社会加速的附属性分析范畴。那么,要完善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就需具体考察技术与社会关系域下技术工具效能及社会中介效应的社会发生规则及其整合机制,最终形成技术与社会全过程作用机制分析,补足罗萨反技术决定论的分析局限。

(一)社会减速的分类与识别:基于加速力与减速力的均衡性比较议题厘析

借助时间社会学视角,罗萨从本体论维度展开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建构,也因其对技术工具效能分析的忽视,使得对技术与社会的作用关系考察不完整。作为技术工具效能分析的薄弱环节——社会减速尽管被视为对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建构的补充议题,但却同样涉及技术与社会的作用关系,对于社会减速的探讨无疑将为考察技术工具效能及社会中介效应的发生机制提供线索。

社会减速是加速的补充探讨部分,罗萨以“现代性就是社会生活加速”这一基本判断作为论证出发点,通过将社会减速定义为与加速“在结构与文化上等量齐观的相反趋势”^⑤,以此来比较论证社会加速是现代社会变迁总体态势的判断。^⑥因此,社会减速被视为社会加速的对立面,两者如同处于对立关系的两股力量,“加速力”与“减速力”是呈现并考察两者性质与关系的具体表达。进而,在以加速为主轴的论证理路下证明加速力胜于减速力才能对应“现代性就是社会生活加速”的基本判断,这使得减速分析通常是围绕加速产生的条件、涉及范畴、后果展开的。^⑦而进一步关联加速循环概念的论证逻辑,可以发现,罗萨对减速的比较分析框架设定,无论是否完整得当,其内在的逻辑本质都与加速循环概念所指向的基于技术、社会、生活作用的关系探讨相契合。

具体而言,罗萨将减速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对应“自然的速度极限”,涉及在“物理性、生物性及人类自身等方面存在的明显速度限制……而其改变则需付出极大的代价”^⑧。诸如感冒、流感或怀孕等生理过程属于此类。第二种对应“减速绿洲”,即“到目前为止部分或完全被排除在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地方”^⑨,它们原则上能被加速,但还是单纯地免于加速过程。诸如传统手工艺、被排斥的群体或社区等都属于此类。第三种对应“因社会加速的失调

而来的减速”,“作为加速过程的意外后果,属于失调性的减速”^⑩,如交通堵塞、工作快节奏引发的抑郁症等问题。第四种对应“刻意减速”,即有意采取的减速形式,分为功能型减速与反抗型意识形态减速两种形式。前者是为更好加速进行的功能型减速,如休渔期政策等,后者是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反抗,为抵制加速的各类负面问题而采取的减速策略,往往与激进的社会运动关联。第五种则对应“结构惰性与文化惰性”,与后现代主义者持有的虚无理念相似,认为“结构、文化意义上的社会停滞并不与现代加速度动力相反,而是代表加速过程本身的一种内在要素和固有的互补原理”^⑪。因此,社会发展变迁越快,也越突出反映结构与文化的晶体化(Crystallization)停滞。这类似韩炳哲对当代社会运作的时间原子化界定,即使社会变迁异常剧烈也难有统一的发展目标与价值引领发展。依据以上分类,罗萨认为各类减速都未构成对“加速力”的根本阻碍,因而“现代性就是社会生活加速”的基本判断也就成立。

不过,既然是在“二力”均衡的比较分析框架中展开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建构,这就要求五种减速的内涵设定均需对应加速力大于减速力的论证逻辑。简言之,需进一步找寻减速的类型学设定逻辑与“二力”比较分析的论证逻辑间的关联。依据技术与社会间型构的关系性分析理路,这也将有可能厘析技术工具效能与社会中介效应的发生规则及转换机制的具体线索。

(二)未完全覆盖的加速规则反思:社会减速的类型学再定向

结合前面加速动力化机制及其范畴的理论建构线索,“二力”比较分析实质上指向以社会竞争与世俗文化为支撑的“加速规则”普及性衡量。因而,一方面,这一“加速规则”可视为“二力”均衡性比较分析的具体线索,当作为“加速规则”的社会竞争与享乐主义盛行时,则可看作加速力大于减速力的关键证据,反之,则更多以反“加速规则”的社会减速形式出现。另一方面,既然罗萨通过五种减速划分及其“各个击破”的分析策略来展开比较论证,这就要求五种减速的类型化逻辑契合“加速规则”的比较标准限定。这样一来,诸减速性质设定都应满足“加速规

则”普及性大于“反加速规则”普及性的论证。

从五种减速类型上看,第一、二种减速类型化定位均以加速动力化及其范畴问题为依据展开基于“加速规则”的比较分析,在生理极限与空白的“绿洲地带”事例中,比较的“加速规则”处于支配地位。而就后三种减速看,减速内涵与性质设定均超出了基于“加速规则”与“反加速规则”二元比较分析范畴,分别指向“加速规则”的非常态变异、构成性附属、符号化拒斥、结构性虚无等关系。如果说,五类减速是立足一定客观经验为基础的划分,那么这种论证错位问题显然是比较分析框架的设定局限,二元与反二元加速规则难以完全覆盖非二元性“加速规则”为线索的减速类型设定,无法满足“二力”均衡论证逻辑。

因此,罗萨“现代性就是社会生活加速”的基本判断不能单纯以加速力大于减速力的二元性“加速规则”比较为基础,通过减速的类型学分析来满足论证,后三种减速的性质设定超出了二元性“加速规则”限定的比较分析范畴。或可将五类减速进一步归类为二元“加速规则”与非二元“加速规则”支撑下的两大减速类型,而这也与技术与社会的作用关系考察相衔接。无论是被置于二元关系的“加速规则”内还是出离其外,诸如技术应用的极限问题、技术普及的空白问题、技术创新的风险问题等实际上都隐藏着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脉络,所谓二元与非二元“加速规则”下减速内涵设定呼应着先前对技术与社会的两种作用机制的分析性理想划分,这也是加速循环概念本身所忽视的论证部分。

换句话说,减速的类型学划分,更像是罗萨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建构中的“非预期意外”,一方面,尽管与罗萨有关社会加速基本判断的补充性论证逻辑完整契合,但另一方面,二元与非二元“加速规则”下的减速内涵设定实际上为考察技术与社会关系及其作用规则,即清晰呈现技术工具效能与社会中介效应的社会建构提供分析理路。

(三)共同生产视域下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建构

依据二元性“加速规则”与非二元性“加速规则”为依托的两大类减速划分,可以发现,属于二元“加速规则”范畴的前两类减速指向具大小、次序等特质的线性机械范畴,^⑧后三者指向具结构性、符号性等

的非线性质性范畴。因此,两大类减速均同技术工具效能和社会效应所分别指向的两种技术与社会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呼应。只不过,在仅以加速为主轴的二元比较分析框架中,减速被视为加速分析附属品,难以同技术与社会作用机制探讨关联,自然也缺失了对所谓减速的质性内涵考量。^⑨下面将以两大类减速发生的规则机制(二元与非二元)为起点,考察技术工具效能与社会中介效应的作用关系问题。

依据技术与社会间两种作用关系的分析性设定,二元“加速规则”的线性减速与非二元“加速规则”的质性减速其实就对应于技术与社会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二元“加速规则”下,所谓加速力与减速力的均衡问题即指向技术工具效能的社会性证成。非二元“加速规则”下,加速与减速的生成更多指向规则的符号化与解构化,难以借助“加速规则”范畴普及性、先后次序等指标直接厘定,从而偏重技术与社会关系中社会中介效应证成问题。而在由二元与非二元“加速规则”所支撑的两类技术与社会作用关系的分析性设定与比较中,尽管两种作用机制及其逻辑不尽相同,但在加减速的现实生成语境中却并非相互区隔,而是作为现代性一体两面的属性关系留有转换空间。如在第二类“绿洲型”减速中,未被加速侵蚀的“地带”“物件”等减速象征往往以复古的时髦形式被“制造”出来,诸如当代慢运动、慢生活所构筑的减速生活方式便是典型,消费的政治经济学是拓殖“减速绿洲”的核心逻辑。^⑩因此,“减速绿洲”往往并不以抵抗加速的防御形态呈现。

在这里,借助科学技术社会学视角来说明以上基于技术与社会的两种分析性作用关系的链接融通问题。根本上,技术与社会是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的相互形塑关系,^⑪即两者本身的知识及其形态受社会形塑的同时,也对社会产生巨大作用,对科学技术而言,不能从科学技术外部谈论两者的共同生产关系及其作用,应以线性的技术或社会的决定论立场把握。^⑫这样看来,在现实的技术与社会互动实践中,各社会加速主体、要素间所形塑的过程性、动态性关系实践其实是同构的。质言之,技术工具效能与社会中介效应虽然从分析性角度对应于二元与非二元“加速规则”下的两种技术与社会作用关系形

态,但在不同主体实践中两者却是同一过程的。进一步,依据型构社会学的关系性思路,以上技术与社会间的互动实践可在从宏观技术范式变革到中微观技术社会建构的融通论证中加以考察。

在早期发明社会学者那里,技术发明就被认为是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循序渐进过程。吉尔菲兰指出:“发明包含的复杂结构组成元素的数量是巨大的,而不仅仅是专利代理人在专利的权利要求书中所罗列的发明的一条条新结构”^⑦。这意味着“发明是微小细节不断组合、积累、修正、完善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创造”^⑧。那么,首先从宏观长时段的技术范式变革实践中对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作用加以分析观照,多茜通过整合纳尔逊和温特的自然轨道理论与库恩科学范式论提出技术范式概念,即“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或模型,这些解决问题的办法立足于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所选择的材料技术”^⑨。作为技术创新的动态过程,它指明了技术创新向何处去的问题,限定了技术创新演化的领域、问题与路径。如在常规阶段,某一技术范式主导下,围绕某一技术问题形成由技术解决方案、工具、工艺等要素组成的技术轨道,呈现出特定的连续性技术创新模式。在革命阶段,围绕相同技术问题则产生众多异质性的技术轨道,导致技术范式间的竞争,此时,技术创新多是非连续性点状的。直到主导设计出现,技术演化重新从动荡转向稳定,技术创新又进入连续性创新的累积模式。^⑩可以看到,在宏观长时段技术范式变革中,技术与社会的作用呈现为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技术创新路径,而不同技术范式对应不同的技术与社会互动实践机制及规则,因而只有在常规阶段的特定技术范式内例如同个创新轨道内,才有可能展开对于技术与社会互动实践的具体考察。

进一步,针对常规阶段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实践问题,需深入于中微观技术的社会性建构中加以理解,不同社会主体的介入作用尤为关键。以平齐和比克为代表的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者就指出,技术制品创新与应用是不同社会群体协商的过程。不同社会群体赋予人工制品不同的社会意义,同时衍生出诸多有关技术的纷争。而其中技术的稳定化机制则发挥着将争论与矛盾闭合统一的作用。^⑪在休斯的

技术系统论中,技术创新由发明、开发、创新、技术转移、成长创新和巩固等不同的理想阶段构成。发明者、销售者、企业家等不同角色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作用,进而政治、文化、市场等不同要素也参与到技术创新中,不同要素共同构成了系统性的无缝之网。而以卡隆、拉图尔、劳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说学者则主张取消物与非物行动者的区分,技术在行动者网络中,由异质性要素间的转译链接生成。^⑫

总之,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作用以共同生产的同构方式被确立,而无论是在宏观技术变革抑或中微观技术的社会建构,技术创新与应用并不以单纯工具理性的方式展开。质言之,在实际技术与社会交互实践中,技术工具效能的社会证成的另一面也是反向社会中中介效应发挥的过程。

四、社会失速:动态化稳定机制下的衍生属性

从分析维度看,尽管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作用类型指向技术工具效能与社会中介效应二分,但在两者共同生产的同构实践中,却是共同生产的一体两面关系。这不仅说明原先基于二元“加速规则”下“二力”均衡的比较方法有局限,也意味着需要就社会加速与社会减速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而基于长时段关系性结构考察的型构社会学理路,即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作用置入埃利亚斯所谓长时段技术化(Technization)与文明化(Civilization)的相融汇过程中加以理解。

(一)技术化进程下社会减速的实体性证成

这里的技术化是将物质转换为有利于实现美好生活的社会化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如制度、规范等各类社会性配套知识的设计与引导,个人对配套制度规范学习的社会化过程是技术化开展的重要条件,如汽车发明后,汽车驾驶需要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配套引导。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下,技术化与社会化两者互为一体,基于社会竞争的美好生活追求成为推动整个技术化与文明化的不竭动力。^⑬

可以说,技术化是技术范式内连续性技术创新与技术范式间非连续性创新的统一。在美好生活的追求下,技术创新实践即是不不断演进的非线性开放的历程。具言之,在技术范式更迭与稳固的技术化历程中,技术发明与创新是不不断基于技术性质本身的社会化历程,而社会化便具有基于制度规范变化

的相对性。那么,在技术范式转换过程中,社会加速与减速便是其中不断进行相互切换的两种过程,^④因社会化与技术化一体,社会化所指向的规范一方面是非绝对工具理性的,另一方面也不断深入技术化语境中影响加速规则的实现。如罗萨的第二种减速——“减速绿洲”中,所谓“绿洲”在长时段技术创新的开放语境下也是相对意义上的。在新技术范式的革新与稳固的技术化进程下,个人、群体、组织乃至国家的创新需求不断发展演变,不仅助推着技术的社会性创新,新的“减速绿洲”也被不断“发现”。

因此,当把目光投向长时段的技术范式演变历程,尽管工具效能指向的线性加速是这一历程中的显著征象,但却可能仅是依循某一特定技术范式及其连续性创新标准时呈现的短暂特质。在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创新相统一的技术范式稳固与转换中,有关技术工艺、工具的效能标准也不断面临社会化形塑,技术制品创新规则也就难以借助统一的最优工具效能标准通用,基于不同规则的加速就不能进行比较。一定程度上,这也打断了某一特定加速规则下社会加速逻辑的一贯性,进而就特定加速规则下社会加速的总体判断就是无效的。由此不同技术范式下加速规则的殊异将使得减速成为长时段技术化进程下工具效能之社会证成的应有之义。即使在特定技术范式内的连续性创新过程中,相同技术也会如前文所述被赋予不同的社会意义,引发社会对技术的理解与接受度差异,导致不同主体间创新速率的结构性错位,如休斯的反向凸角(Reverse Salient)便是其中典型。^⑤

概言之,无论是在长时段技术范式转换下的非连续性创新还是特定技术范式内的连续性创新,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共同生产的相互形塑关系而并不偏向任何一方。技术范式变革阶段,社会加速与减速是技术化进程中的存在属性而不具纯粹的决定论意义。技术范式的稳固阶段,即使沿着连续性技术创新轨道,社会主体及其组成的“无缝之网”也将可能引发技术加速速率的结构性错位,技术的社会化背后,加速与减速也将相伴而生。

据此,回到社会变迁的总体态势判断上,正是技术的社会化使得社会加速与减速始终是相伴而生的

一体两面,这就不能以线性的、目的论的方式探讨现代社会的时间模式。换句话说,不能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均衡型刚性社会时间模式(无论加速或减速)来判断社会变迁总体态势,而需考察技术社会化语境来延展对现代社会时间模式的理解。

(二)动态均衡中的社会失速危机

在技术与社会的共同生产视域下,不仅技术工具效能与社会效应的社会证成于宏观与微观建构上是同构的,也意味着社会加速与减速在技术社会化语境下存在一体两面关系。基于加速与减速间刚性均衡的社会时间模式设定不再适用,对社会发展变迁态势的判断就不能以加速力与减速力之间的比较为依据。那么,应如何把握技术与社会共同生产中社会加速与减速所共同构筑的非二元的现代社会时间模式呢?在此,如将社会加速与减速作为现代社会发展常态化运作中的存在属性,那么对当前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代表的非常态社会运作逻辑考察将是立足技术社会化语境、以非二元加速力与减速力的均衡性比较分析理路理解现代社会时间模式的关键。

罗萨近年来建立了由占用(Appropriation)、加速(Acceleration)、激化(Activation)等三个机制所维系的晚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作模型——即3A模型(Triple A Model)。^⑥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离不开由以上三种机制所支撑的社会发展上升(Escalation)逻辑,三类机制在发挥功能时就“如同一辆自行车,稳定性的获得来自向前进,降速或停止时则会倾斜”^⑦。即3A模型的有效运作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向前发展与稳定,否则将面临社会失序与失速危机。

具体而言,占用首先指向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拓展。资本主义发展需借助对外部环境中如土地、资源、资本等诸多要素的占用来实现原始积累,众多“非资本的他者(Non-Capitalist Other)在占用中就被不断热烈地制造出来”^⑧,剥削与排斥随之产生。在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随着以往相对固定的时、空间被不断打碎,不同区域国家间呈现出发展不平等。此时,资本主义的占用将向形塑“他者”个性结构、情感需求等深层次转变。另一方面,占用过程通常与社会加速相伴,无论是以目标导向的技术加速,还是涉及代际问题的社会变迁加

速,抑或日常生活的加速体验,都与资本要素加速流动下占据、吸纳、排斥等一系列过程紧密关联。进一步,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占用与加速的基础条件不同,这需要赋予一种弹性的制度化实践来实现占用目标。政治的激化(Activition)正是作为一种超越历史结构的动态化原则(Dynamization),发挥着占用与加速的现实发生动力功能。于是,资本主义国家如何保持制度设计与管理创新,以便实现占用与加速机制的持续运作,从而保障社会秩序稳定成为应有之义。换句话说,这助推了政治参与的个体化进程,身处其中的个人倾向于通过各类政治性社会运动来实现对国家的合法化想象,这看似是个体的民主化进程实则是一种权力控制的新形态。^⑧而3A模型的正常运作也需要满足既定条件来保障其功能发挥,否则将出现社会失序危机。

从运作的基本条件上,3A模型的有效运作需要各方面资源、能量支撑。经济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能源支持,而对GDP目标的单纯追求将加剧对诸如教育政策、劳动力市场、养老金制度等方面的变革刺激,这逼促着个人在高度的社会竞争中投入更多时间精力。而即使社会发展所需的资源能量得以保障,仍可能出现发展的结构性错位问题,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张力,当生态环境净化速度慢于经济发展带来的垃圾排放速度,前者的破坏将阻碍后者的发展。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间,前者的发展常常是建立在对后者的减速抑制基础上,这种发展的不均极有可能引发冲突,进而造成社会发展失速危机。

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演变历程中,无论是在福特主义或后福特主义的发展阶段,尽管在运作形式与路径上有所不同,占用、加速与激化的动态化稳定机制一直在运作。尤其是在以后福特主义为代表的晚期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生产体制向基于市场的外包型、小规模、弹性化的运作逻辑转换,生产技术、管理工具乃至劳动模式等方面不断聚焦“弹性式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为核心的变革逻辑,这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在更加微妙的动态化均衡状态中维系。^⑨根本上,这种动态均衡的失序危机背后更潜藏着技术创新实践下的发展脆弱性难题,突出反映

在工作场景中技术实践所引发的社会失速问题。

在当前算法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新背景下,技术实践不断被引向新的极限,这将可能自反性地衍生出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危机。日常工作场景中,效率至上是道德律令,个人往往担负多种工作角色,新兴技术被作为个人的赋能工具,^⑩如在数字日历等时间管理工具的运用下,“个人工作时间不断以可视化、量化方式切分以适应多任务工作模式,个人认知及其自我控制也受到形塑”^⑪,此时,“时间变得扁平化,它无法捕捉我们的生活体验,即时间无显著的差异化与质性属性”^⑫,时间更像是可以自由组合的流动模块。在权力嵌入与信息共享机制下,这些可自由组合的时间模块也成为新技术创新实践下对个人日常监控的新路径。因此,随着时间不断被诸如数字技术实践形塑,时间的碎片化与模块化也造成时间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功能难以发挥,进而削弱了日常生活中个体对未来预测的可能。^⑬

总之,由3A模型所支撑的资本主义社会运作过程蕴藏着社会失速危机,日常生活的工作场景中,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实践不断迈向新的极限,个人日常生活将因新兴技术的理性筹划功能失败而衍生出个体时间虚无化的困境局面,这即是内含于常态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运作过程中的社会失速。

结论

自社会学诞生以来,如何回应各类现代性议题是考察社会学自身学科发展的重要线索,社会加速是其中重要的前沿议题之一,其议题的诞生离不开个体的社会认知模式转型。在从经验型认知模式向事件型认知模式转型过程中,个体对社会的想象与认知不断拓展,促进了自然、社会、文化等不同认知域相互整合,在诸多概念、命题的发散与融汇中为探讨以社会加速为代表的社会新现象、问题提供可能。而这一认知转型也形塑了过去乃至当前的社会加速研究理路。

从古典社会学时期开始,众多学者便涉足对社会加速相关议题的探讨,当代社会加速研究更是呈现出研究议题多元化的趋势,但背后的多因论与单因论两大分析取向却造成对社会加速的本体论维度讨论缺失。对此,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成为系

统理解社会加速的重要尝试。罗萨认为,社会加速与维系社会运作的符号系统——社会时间密切相关,社会加速可被视为基于众多社会主体、要素所形塑的时间制度规范实践模式,不同主体、要素间长期的社会型构历程是这一实践模式生成的关键。这样一来,社会加速研究就被转换为由技术、社会、生活等不同加速要素间的关系作用问题考察,即特定技术与社会关系作用便对应特定的社会时间模式,社会加速便是其中的模式之一。据此,这种围绕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加速考察也让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相比以韩炳哲为代表的后现代虚无加速观更具现实解释力。

不过,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并未就技术工具效能的社会建构问题展开探讨,而直接预设了技术工具效能的天然性,这便造成其立足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加速理论带有决定论色彩。通过比较罗萨对五种社会减速的类型化逻辑与其“二力均衡”的比较分析框架发现,五种减速的内涵设定背后实质上可推演出基于二元加速规则与非二元加速规则的两大减速生成逻辑,这就溢出了二力均衡的比较分析框架,从而难以简单得出类似“现代社会生活就是加速”这一社会变迁总体态势的判断。进一步,在科学技术社会学视域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宏观长时段的技术范式变革或是在短时段技术的社会建构的技术社会化语境下,技术工具效能与社会中介效应的社会证成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这意味着作为两种社会时间模式,社会加速与社会减速是社会发展变迁中一体两面的存在属性而非彼此对立的均衡性关系,社会减速不是社会加速的附属品,进一步,有关“现代社会生活就是加速”的总体态势判断也需限定于特定的技术社会化范畴,即同一个技术范式及其轨道内。正因如此,就有必要将目光转向由社会加速与减速所支撑的看似常态均衡的社会运作中,以便对现代社会中的时间模式做进一步拓展考察。

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运作逻辑考察为依据,社会失序问题成为以占用、加速、激化等机制支撑的动态稳定社会运作的应有之义。尤其在日常生活的工作场景中,数字技术的创新实践不断为个人日常生活筹划赋予新的极限,不断衍生出的理性悖反及时间虚无化问题诱发了日常生活中的失序危机。于

是,从宏观技术变革到中微观技术社会建构中,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孕生出社会失速问题,社会失速也成为社会加速与社会减速之外的第三种社会时间模式,三者共同构成理解当代社会时间模式的“铁三角”。

注释:

① Filip Vostal, "Thematizing Speed: Between Critical Theory and Cultural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17, No. 1, 2014, pp. 95-114.

② Björn Wittrock, "Modernity: One, None, or Many? European Origins and Modernity as a Global Condition," *Daedalus*, Vol. 129, No. 1, 2000, pp. 31-60.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Vol. 129, No. 1, 2000, pp. 1-29.

③ Yuriy Savelyev, "Dimensions and Antinomie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Thesis Eleven*, Vol. 158, No. 1, 2020, pp. 81-95.

④ Peter Wagner, "Multiple Trajectories of Modernity: Why Social Theory Ne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sis Eleven*, Vol. 100, No. 1, 2010, pp. 53-60.

⑤ Rob Shields, "Boundary-Thinking in Theories of the Present: The Virtualit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9, No. 2, 2006, pp. 223-237.

⑥ 存在焦虑可视为促成个体社会认知模式转型的重要动力,也给大力借助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开展研究的社会学及其理论建构产生影响,这里聚焦于有关认知模式转型对社会学研究路径、取向塑造,对认知与焦虑的议题不再赘述。罗萨就以渔夫与企业家的故事来展开两类不同认知模式的比较分析,参见: Hartmut Rosa,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xxxiv-xxxviii。徐律:《社会焦虑何以可能:一项基于个体性视角下的反身性探索》,《浙江学刊》2021年第4期。

⑦ Iain Wilkinson, *Anxiety in a Risk Society*, Routledge, 2001, p. 42.

⑧ Iain Wilkinson, "Where Is the Novelty in Our Current Age of Anx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2, No. 4, 1999, pp. 445-467.

⑨ Margaret Archer, *Social Morphogenesis*, Springer, 2013, p. 1.

⑩ 多因论与单因论是两种社会学研究取向,前者承认社会现象发生的多因素作用的复杂一面,但倾向于将复杂社会现象放入自然科学“机械的(Mechanical),有机的(Organic),控制论的(Cybernetic)”工具黑箱中,用自然科学式的隐喻替代深层的机制解释,是“以多及一”的研究理路。而后者偏重基于单因素为主轴的宏大理论叙事,没有具体就现象发生时不同因素间的关联性(Relationality)及过程性进行探讨,从而容易造成研究者在本事物认知与事物存在判断上的认识论谬误,模糊了认识论与本

体论边界。但实际上,事物被认知的社会基础与事物存在的社会基础经常是错位的,不能单纯依据感知来做事物的绝对客观性判断,这种“所感即所是”的认识论谬误忽视了社会现象发生的历史性基础,是“以一及多”的研究理路。因此,两者代表了社会机制解释存在的弱替代与强分析两种简化取向。而论证逻辑上,多元化议题与宏大理论叙事互为补充,常常相伴而生。

⑪ John Tomlinson, *The Culture of Speed: The Coming of Immediacy*, Sage, 2007, pp. 5-7.

⑫ Filip Vostal, "Thematizing Speed: Between Critical Theory and Cultural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17, No. 1, 2014, pp. 95-114.

⑬ 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Polity, 2000, pp. 9, 14, 73, 120.

⑭ John Urry, *Global Complexity*, Polity, 2003.

⑮ Margaret Archer, *Social Morphogenesis*, Springer, 2013, p. 22.

⑯⑰⑱ Hartmut Rosa,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2, 1, 4-5, 6.

⑲ Norbert Elias:《论时间》,李中文译,群学出版社,2014年;徐律:《时间的社会学想象:文明化进程下的反思性展演》,《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6期。

⑳ 尽管罗萨已涉及在社会加速分析中就社会时间结构与时间模式进行讨论,如“现代社会的时间模式有助于说明时间实践的社会结构构成”,但更聚焦于社会加速研究的总体性研究趋势及其局限的辨析,借助对作为规范的社会时间及其结构性质讨论来理解规范性、结构性的时间制度功能,而未就个体与社会、系统与行动等不同要素、主体的互动过程充分探讨,因此,正文将社会加速视为社会时间模式,更多是立足于罗萨“社会加速是现代社会时间结构”这一立论基础,通过引入关系性实践的类型视角所做的进一步理论分析延展,借此互动实践的过程性分析也将被赋予长时段、关系性的可能,从而增进社会加速分析的立体性,并为社会变迁总体态势判断赋予更加合理的分析基础。参见 Hartmut Rosa,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p. 9.

㉑ Isaac Reed, "When Acceleration Negate Progres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43, No. 6, 2014, pp. 820-823.

㉒⑳㉓⑳ Hartmut Rosa,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pp. 71, 74, 76, 78.

㉔ Hartmut Rosa,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pp. 151-159.

㉕ Isaac Reed, "When Acceleration Negate Progres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43, No. 6, 2014, pp. 820-823.

㉖ 韩炳哲:《时间的味道》,包向飞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

㉗⑳㉘⑳ 韩炳哲:《时间的味道》,包向飞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0-71、11页。

㉙ Hartmut Rosa,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p. 97.

㉚ 依据技术社会学理路,工具效能的社会性建构及其社

会效应转换问题是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同一过程,文中将这一关系区分为技术工具效能与社会中介效应两种技术与社会作用的阶段类型,更多为考察罗萨加速循环概念的分析局限所做的分析性处理,关键在于如何借助理想型的阶段分析来为两者间的作用过程给予完整有效解释,即在论证工具效能社会性基础的同时,通过与社会效应转换的链接来完整呈现加速背后涉及的技术与社会作用。而罗萨在后续社会减速的分类说明中并未给予实质性论证回应,因此,正文将在补足技术工具效能的社会证成基础上,进行两个阶段技术与社会作用的分析性逻辑链接,这也为拒斥单纯的加速VS减速的二元分析框架及减速作为非附属性分析对象提供可能。

㉛⑳㉜⑳ Hartmut Rosa,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pp. 90, 81, 83, 84, 89.

㉝ 类似论述也表明罗萨将减速与加速视为均衡性的比较分析对象,如他认为加速作为总体态势的判断基础在于“必须要证明加速的力量系统性地胜过减速的力量”,参见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郑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2页。

㉞ 如果前面罗萨的操作化与加速循环只是从社会加速范畴上为其赋予了学理化分析基础,那么这部分则通过减速分析为社会加速作为总体性态势的现实状况提供判断依据。罗萨似乎更在意从后者的现状论证出发赋予社会加速现实性,正因如此,《加速》一书中第三章就是以“什么是社会加速”为主题来展开的。

㉟ 需要再次强调,这里的“线性加速”仅就技术的工具效能而言,指向“二元”性加速规则下技术对社会的巨大作用,而并不意味着技术决定论意义上技术—社会的线性作用关系及其机制。诸多线性加速的工具效能,如汽车、飞机等技术发明缩短了物理空间距离,实际包含着复杂的技术与社会作用过程。同样地,“二元”加速规则也指向技术与社会的二分,是为了分析而做出的理想型划分,也并不指向两者对立的作用关系。换句话说,正文这部分采用“线性”与“二元”等词是为接下来更好呈现其中复杂的技术—社会关系,即从加速主体的实在性角度为技术与社会作用的关系性分析提供基础。而这也与韩炳哲将加速主体的实在性与分析手段混淆的线性化界定不同。这里的二元更偏向爱丁堡学派的认识论维度下的互动式共同生产观,而非行动者网络理论基于本体论维度的构成型生产观。

㊱ 罗萨的这种理想型分析并没有在这一基础上对科技加速的工具效能进行详细考察。这便带来一个后果,如果科技加速的天然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社会对科技工具的作用则是不完整的,一旦社会的反向中介效应得以发挥,加速成为总体态势,则相应减速内涵本身也将受到这股线性科技的加速影响而扁平化。以至于罗萨在文本中并没有如对加速的内涵论证那般从科技减速、社会变迁减速、生活减速等不同维度来论证,带有一定的决定论色彩。Filip Vostal, "Thematizing Speed: Between Critical Theory and Cultural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17, No. 1, 2014, pp. 95-114.

㊲ 有关减速的意识形态批判参见:Joseph Heath and Andrew Potter, *The Rebel Sell*, Harper Collins, 2005. Koepnick L., *On Slownes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the Contempo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Nick Osbaldiston, *Culture of the Slow: Social Deceleration in an Accelerated World*,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Wendy Parkins and Geoff Craig, *Slow Living*, Berg, 2006.

⑤ 共同生产说是当前科学技术社会学(STS)研究中围绕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进行阐释的视角。就传统上,一直存在技术与社会相互形塑的说法,但所谓“相互形塑说”所延伸出的理论内涵常常迥异,难以定性。如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同样强调相互形塑,但两者在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作用定性上却分别指向知识的外部结构与知识的具体内容,从而导致认识论上的差异。共同生产说的出现正为进一步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系统路径,相关研究介绍参见胡万亨:《如何“从STS的视角看”?——关于科学与社会秩序之“共同生产观”的几个问题》,《清华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14辑。

⑥ Sheila Jasanoff, "The Idiom of Co-Production," In Sheila Jasanoff, *States of Knowledge: The Co-P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the Social Order*, Routledge, 2004, pp. 1-12.

⑦ Seabury Colum Gilfillan, "Who Invented It," *The Scientific Monthly*, Vol. 25, No. 6, 1927, pp. 529-534.

⑧ Seabury Colum Gilfillan, *The Sociology of Invention: An Essay in the Social Causes of Technic Invention and Some of Its Social Results: Especially as Demonstra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Ship*, Follet Publishing Company, 1935, p. 3.

⑨ Giovanni Dosi,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Research Policy*, Vol. 11, No. 3, 1982, pp. 147-162.

⑩ 主导设计产生是技术演化周期的分水岭,是链接技术范式变革期与常规期两个阶段的关键节点,意味着后续技术工艺、系统等保持稳定。具体参见James Utterback and William Abernathy, "A Dynamic Model of Process and Product Innovation," *Omega*, Vol. 3, 1975, pp. 639-656. William Abernathy and James Utterback, "Pattern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Technology Review," *The Journal of Science Policy and Research Management*, Vol. 3, No. 4, 1988, p. 555.

⑪ Trevor Pinch and Wiebe Bijk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ifacts: Or How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Might Benefit Each Othe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14, No. 3, 2016, pp. 399-441.

⑫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John Law, Michel Callon and James Utterback, "Engineering and Sociology in a Military Aircraft Project: A Network Analysi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Social Problem*, Vol. 35, No. 3, 1988, pp. 284-297.

⑬ Norbert Elias, "Techn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12, No. 3, 1995, pp. 7-42.

⑭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基于长时段技术范式转换下加速与减速的转换问题涉及不同技术轨道、标准下的社会速度比较。因此,文中的“加速与减速并存”推论并不与日常生活中各种技术工具效能的呈现对应,而是为了更好地回应罗萨二元加速规则下加速大于减速的线性论证逻辑。诸如对晚期现

代社会中弹性工作模式与早期工业化社会中累积性工作模式的比较,才视为对以上基于不同技术范式及其社会组织形态下社会时间/速度的比较范例。参见郑作或:《时间结构的改变与当代时间政治的问题:一个时间社会学的分析》,《台湾社会学刊》2010年总第44期。

⑮ Thomas Hughes, "The Evolution of Large Technological Systems," In Thomas Hughes, Wiebe Bijker and Trevor Pinch,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MIT Press, 1987, pp. 51-82.

⑯ Hartmut Rosa, Klaus Dorre and Stephan Lessenich, "Appropriation, Activation and Acceleration: The Escalatory Logics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and the Crises of Dynamic Stabiliza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34, No. 1, 2017, pp. 53-73.

⑰ Klaus Dorre, "Capitalism, Landnahme and Social Time Regimes: An Outline," *Time & Society*, Vol. 20, No. 1, 2011, pp. 69-93.

⑱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39.

⑲ Mitchell Dean, "Governing the Unemployed Self in an Active Society," *Economy and Society*, 1995, Vol. 24, No. 4, pp. 559-583. William Walters, "The 'Active Society': New Designs for Social Policy," *Policy and Politics*, Vol. 25, No. 3, 1997, pp. 221-234. Stephan Lessenich, "Constructing the Socialized Self: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in the 'Active Society'," In Ulrich Bröckling, Thomas Lemke and Susanne Krasmann, *Governmentality: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Routledge, 2011.

⑳ Michael Plores and Charles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Basic Books, 1984.

㉑ Nick Couldry and Andrews Hepp,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Polity, 2017. John Fornas, "The Mediatization of Third-Time Tools: Culturalizing and Historicizing Tempor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0, No. 52, 2016, pp. 13-32. Christian Pentzold, "Between Moments and Millennia: Temporalising Mediatiza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40, No. 6, 2018, pp. 927-937.

㉒ Judy Wajcman, "The Digital Architecture of Time Management,"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Vol. 44, No. 2, 2019, pp. 315-337.

㉓ 需要指出,在技术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个体的实践能动性也会影响技术的社会效应,同一个技术应用会衍生出不同的技术实践类型。正文中侧重对数字技术的支配逻辑进行讨论,相关研究参见Karl H. Hörning, Daniela Ahrens and Anette Gerhard, "Do Technologies Have Time? New Practices of Tim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ime & Society*, Vol. 8, No. 2-3, 1999, pp. 293-308.

㉔ Sytze Kingma and Kees Boersma, "No Time to Spare? Time and Technology," *Time & Society*, Vol. 11, No. 2/3, 2002, pp. 353-357.